

你會說多少種語言？ 多語及語言的經濟學： 葡萄牙語在中國的情況

羅世賢*

語言的多樣性是資源，其價值被廣泛地低估。**

皮特·姆哈斯特雷爾¹

對於我來說，管理是以創造道德的手段來實現道德的目的。**

伊恩·米特羅夫²

在歐洲和美國，語言經濟學是一個近期的研究領域，加拿大卻例外。這個領域的研究是努力理解語言變量與經濟變量的影響。

這方面的研究一直專注五個主題的關鍵考量³：

1. 承認掌握一門或以上的語言知識是勞動收入的決定性因素；
2. 某些語言的傳播或衰敗對國際貿易增加的影響；
3. 在當地語言或少數人語言的投資對經濟活動活力的影響；
4. 在翻譯服務總體成本面前，一個多語社會掌握多種語言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 澳門城市大學葡語課程主任。

1. 參見費爾，阿爾韋著、皮特·姆哈斯特雷爾主編：《生態語言學讀本》，紐約，連續出版社，2001年。
2. 參見布朗，T、克雷納，S、迪爾洛夫，D、羅德里格斯，JN：“商業頭腦”，哈洛：《金融時報》，Prentice Hall出版社，2002年。
3. 參見布雷頓，安德烈主編：《語言經濟學的探索》，渥太華，加拿大文化遺產部，新加拿大視野，1999年。

5. 對不同國家所採取的語言政策的成本——效益的分析。

在所有這些研究的主題所關注的潛層是公民在多種語言技能方面投資的重要性，其原因是多種的：認識論、本體論、認知本體論、經濟、道德和實際需要的。⁴

為學習或工作的第二語言的選擇，從個人層面來看，可以是一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

其原因可能是各種各樣的：對不同於自己的某種文化的情感依戀。從履歷和就業而言，那種語言的“經濟”價值，共享一個身份或其他。

然而，作為一種集體財富而選擇一種學習和工作的第二語言屬於一個國家或一個政府的政治態度，因為它需要為教學和學習分配稀缺資源，要權衡成本——效益。換句話說，是一種有意識的人力資本投資，因為作為一種集體財富的語言會增值，尤其是在經濟方面，期望得到回報。

正是通過這組思路，我們可以評估國家和政府對語言政策領域的作用，及我們對人類最重要的象徵性資本重視的程度。不僅是使其能夠使他們與文化相近的人溝通，而且讓他們試著去了解來自不同於自己的世界的文化背景的世界。

語言的多樣性為人類巨大財富之一。但是，許多民族和國家的當權者仍然夢想擁有一種共同語言，自然，帝國主義的想法和做法隨之而來。在這方面，葡萄牙語言學家費得利諾·菲格雷多⁵稱：“一種通用的拉丁文或……，世界語，基礎英語為一種使人精神極度貧困的傾向。凡是有此種思想的人，便是世界上精神貧瘠的人，言語一派陳詞濫調。”

在各行各業的商品和服務領域的產品及消費的經濟、金融交流中，廣泛地使用某種主導語言有明確將象徵性財富統一的政治意圖，

4. 參見羅世賢：《澳門語言遺產》，向“澳門——葡語世界學術研討會，2003年”研討會提交的論文，2003年。

5. 參見菲格雷多·費得利諾：《爭取言論自由》，聖保羅，Cultrix出版社，1973年。

“與之俱來的是經濟的統一，還有文化的生產和流通的統一。”（布迪厄⁶）其基本原則是溝通的有效性，而不需要使用另一種稀有資源——翻譯。

語言霸權的歷史是與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歷史、經濟和政治霸權緊密相連的。從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和法國等歐洲文化來看，我們看到是使世界融為一體的海上擴張的經濟和在不連續的空間佔統治地位的語言；從東方文化的歷史來看，如俄羅斯、阿拉伯和中國。我們看到是那種陸地擴張，也將他們的文化和語言傳到了與其毗連的國家。

根據社會語言學家路易斯·吉恩·卡爾維⁷和亞伯蘭·德·斯旺⁸的分類，所有這些佔優勢的語言，在世界上諸語言中，至今仍享有超級語言的地位。

今天，國際社會的許多國家和民主的公民群體的社會和文化意識的承認，我們的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是人類最大的財富。接受它是從學校開始和從跨文化的世界公民做起，建立一種和平和建設性的文化。世界人權宣言和語言權利宣言是“普世”的，可倡導在建設和平文化過程中的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對話。

它除了抵制某種全球化和單一文化貧瘠的傾向外，還是一種各種傾向和口味的大集成。掌握一門第二、第三或第四語言可獲得理解無數的特點、想法、感受及風俗習慣的能力。它們常常是一個文化的社團所特有的，因而是唯一的。

除此之外，掌握另外一種語言為我們提供了進入一個新的使用者世界的可能性，並與他們進行互動，極大地增加了交往（貿易、投資、就業機會、科技、文化或其他信息交流）。而且貿易交流和語言一直是同一事物的組成部分，由此可見語言經濟的價值（用處）。

6. 參見布迪厄·皮爾：《如何理解：語言交流的經濟學》，巴黎，費耶德出版社，1982年。

7. 參見卡爾維，路易斯·吉恩：《世界語言生態研究》，巴黎，普隆出版社，1999年。

8. 參見德·斯旺，亞伯蘭：《世界的詞語》，劍橋，政治出版社，2001年。

當然，某一個特定的語言社團的大小，對學習語言的選擇是重要的，但不是確定一種語言的經濟價值的唯一的因素。具有官方地位的語言，如印度尼西亞的印尼語、印地語和孟加拉語使用的地緣政治空間是1000萬人口。鑑於這一空間及其與其他經濟地域的經濟關係的發展特徵和程度及其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或許不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選擇。

以上世紀80年代為例，在美國的大學中，對中國語言而言，日語和日本文化學習的需求熱烈。當時學術界和商業界所感興趣的是日本的經濟奇蹟和日本企業的管理模式。這種需求是400%，遠遠高於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需要。日本的人口略多於1億2000萬，而中國擁有超過10億的人口。

正如安德烈·布雷頓⁹強調的那樣，“學習第二或第三語言是個人的決定，代表了知識和文化的濃縮。社會雙語是一個社團的政治意願和承諾的問題。通過這樣一個社團的倡議，學習一門語言可以轉換為經濟資本。熟練掌握可以是一個在經濟上有利可圖的取向。”

各種語言知識是在國際貿易中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請記住，許多條約和協定的執行，即使是以英語簽訂的，幾乎都是用談判雙方的母語準備和進行的。

因此，國際企業界習慣對外派人員的雙語及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投資成本——效益，及人力資本在其產品和服務發展中的積極影響作出分析。

畢竟，這是一個經濟及全球企業系統參考概念重組的“拐點”。¹⁰人們開始認識到，進行“管理”，尤其是在許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是一種文化行為，而不僅是一種單純的技術操作或管理實踐，即所謂的“演示文稿軟件文化”。

9. 參見布雷頓，安德烈：《關於雙語、官方語言與經濟某些經濟方面的思考》，渥太華，加拿大文化遺產部，新加拿大視野，1999年。

10. 參見布朗，T、克雷納，S、迪爾洛夫，D、羅德里格斯，J.N： “商業頭腦”，哈洛：《金融時報》，普倫蒂斯霍爾出版社，2002年。

一方面，學習新的管理是一種新的經濟和企業管理的社會道德。它試圖將基於人的能力培訓與管理多元人文、語言和文化的價值觀和社會後果融入他們的實踐；另一方面，將他們置於生產過程中，而不是資源，更不用說對象，同時要很好地解讀環境的話語，即對管理生產單位的影響力和證明其存在的力量加以解讀。

葡萄牙語在中國的經濟價值

“如果一個人在錫蘭說葡萄牙語，可通行各處。”

科尼利厄斯·讓·西夢思（荷蘭駐錫蘭總督，1704年）

眾所周知，葡萄牙語在亞洲，特別是在澳門，直至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一直是亞洲貿易的通用語言。

如前所述，葡萄牙語在亞洲的存在是在霸權語言的歷史背景中產生的，與一些國家對另外一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霸權的歷史密切相關。

葡萄牙人在澳門維繫了近500年，這純粹是一個歷史偶然。同樣，從五個世紀以來，日本人繼續使用中國文字（漢字），八世紀又以漢字為基礎，創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也是一個歷史偶然。這些歷史偶然來自接觸、交流，但也來自這樣或那樣明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行為。它們為社會塑造了新的思維和生活方式。

的確，人民的歷史經常向我們展示了一方對另一方的統治和剝削關係的乖張怪異及強加給他人的文化身份的語言和文化模式。的確是，人民的歷史常常是不自覺地展示了文化之間慷慨的開放。必須評估和優化這些文化交往與交流的有益之處。

如今，那些在澳門出生，或久居澳門的人很難想像一個有漢語名字，卻沒有葡萄牙語街道名稱的澳門，或一個沒有列入保護建築物的城市（這是使它不同於中國城市的地方和唯一的印記），例如議事亭前地、望德堂堂區、大三巴牌坊，還有媽閣廟、觀音堂及哪吒古廟或天后廟。

中國對葡萄牙語教學的興趣始於1961年。當時在著名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原北京外國語學院，創建了第一個葡萄牙語組。¹¹

非洲的前葡萄牙殖民地獨立後，這種興趣日益擴大。

還有四川省（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成都設立了國際交流中心。它從1976年起，為新的非洲國家工作的醫生、護士和口譯——筆譯員教授葡萄牙語。

90年代初，中葡聯絡小組開始定期會晤時，超過50%的中國代表團成員操著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語。在葡萄牙代表團中，只有翻譯講流利的漢語。

然而，中國學習葡萄牙語需求的大繁榮產生於2005年。當年中國的經濟增長超過了20%，需要聘請語言翻譯，來與巴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有前途的市場對話。

在中國，只要掌握葡萄牙語，就可以在同中國與葡語國家的關係領域和中國國內市場，找到就業機會。

這方面，可以舉出兩個例子。首先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葡萄牙語班的13名青年，按照交流協定，他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所大學內就讀了三年級。

完成四年級課程後，因為掌握葡萄牙語，超過50%的學生獲得了就業：4個在巴西設在上海的企業工作，2名當了葡萄牙語教師，1名當了一個有巴西球員服務的足球俱樂部的翻譯。然而，另一個成為了上海的記者，被派來報導2002年葡萄牙國家隊來澳門的情況。

第二個例子是廣州的一所大學的副校長給我們講的。在一個學英語的學生和學葡萄牙語的學生之間，就業市場始終支付給後者更高的薪水，葡萄牙語的學生的工資高人民幣1千元以上。

11. 參見“葡萄牙語在中國：投資未來”第168期，2011年8月24日，《文學報》副刊第三十一卷，第1067期。

目前，約有19所中國大學教授葡萄牙語課程或選修葡萄牙語課程，但如今要在廣州、北京或上海的勞動力市場上找一個專業的葡語——漢語雙語翻譯是鳳毛麟角。

結論

在澳門及中國對葡萄牙語需求增加的現象的解釋基於一個最具決定性的原因，即語言的上升和下降：其經濟價值。因此，在澳門和中國，過去的六年中，在語言尋求方面，葡萄牙語有了顯著的上升。從準確無誤的務實成本——效益來看，學習葡萄牙語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¹²及其為澳門經濟制定的重要步驟可能為推動中國對葡萄牙語需求的新動力，開啟澳門未來發展的一個新時代。這是第一次在中央政府的五年規劃中，有澳門的專門章節。

五年規劃發出了一個支持澳門發展的明確信號。它將澳門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並建議將澳門建成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的服務平台。“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加快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第五十七章，第一節）¹³

這意味著，澳門經濟應加強它作為國際貿易和投資首選地的職能，加強它在中國舉辦會展的坐標的功能，提供商機。

五年規劃所強調的另一個方面是澳門經濟必需多元化，不僅僅同中國大陸，而且同葡語國家交往。新興市場能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像中國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一樣。

在此背景下，澳門所扮演的角色和責任越來越重大，發揮聯繫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的作用。在此過程中，葡萄牙語是最好的溝通工具。澳門論壇正是明確地體現了中國中央政府這個意圖。

12. 參見[http://www.asifma.org/uploadedFiles/Resources/PRC-12th-FYP\(1\).PDF](http://www.asifma.org/uploadedFiles/Resources/PRC-12th-FYP(1).PDF)。

13. 參見同上，第十二個五年規劃。

